



1912-2012

中华书局创建一百周年纪念

百年中華

中華書局

1456229



中華書局創建一百周年紀念

百年中華



淮陰師院圖書館1456229

中華書局

书 名 百年中华

文案策划 胡友鸣

责任编辑 翁向红 丛 绿

图片编辑 张 露

篆 刻 刘家骏

封面设计 毛 淳

版式设计 刘 丽

出 版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2月北京第1版



目录

CONTENTS

2

百年岁月 时代芳华

——中华书局创建一百周年寄语

6

一、创业辉煌 1912—1949

46

二、专业之路 1949—1978

90

三、探索发展 1978—2002

128

四、守正出新 2002—2012

162

附 录



目录

CONTENTS

2

百年岁月 时代芳华

——中华书局创建一百周年寄语

6

一、创业辉煌 1912—1949

46

二、专业之路 1949—1978

90

三、探索发展 1978—2002

128

四、守正出新 2002—2012

162

附 录



百年岁月

1912年元旦，在南京，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同一天，在上海，中华书局应运而生。

今天，中华书局迎来了她100岁的生日。

100年，中华人趟过了中国近现代出版的长河，水声激激风吹衣；100年，中华人栽种起中国文化学术的书林，红如丹砂绿似碧。100年来，天光云影，潮起潮落，那些逝去的人和事，那些繁简横竖排列的文字，那些在心灵深处叩发的激动和温情，今天，都在生日的杯酒中荡漾。

前贤逝矣，只有比人长寿的书可以留下，只有我们千淬百炼的理想不曾磨灭。

我们关注国民教育——

书局创始人陆费伯鸿先生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我们关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

铭刻先民作息的甲骨金文，书写战国秦汉的竹简帛书，绵延我中华悠久历史的官修私修史册，振拔我中华民族理性的诸子百家学说，荡涤我中华儿女情怀的唐诗宋词，含蕴我中华绚丽文化的佛道典籍、敦煌宝藏、海外逸珍……这一片片中华民族精神的田园，是我们呵之护之、爱之惜之、经之营之、无日忘之的劳作之地。

我们由衷感念梁启超、马君武、叶圣陶、李劫人、徐悲鸿、刘海粟、齐燕铭、吴晗、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王力、钱锺书、唐长孺、启功、季羡林、任继愈……这一代代学界大家和文艺泰斗，将他们一座座著述的丰碑，融入书局百年基业，为中华的发展注入绵绵期许与厚望。百年同行，鱼水之情，思念不已，感激不尽！我们无法忘记陆费逵、范源廉、舒新城、张相、李达、田汉、张闻天、金兆梓、陈伯吹、钱歌川、金灿然、宋云彬、



时代芳华

章锡琛、陈乃乾、徐调孚、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李侃等数代编辑同人的文化深情和文化理想。回望得到中外学人认可的几千种古籍学术著作，盘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万千普及读物，轻抚案头近六百种获奖图书，历数各类名列前茅的国家级出版奖项……我们在自豪中仍有志忑，不知这一切是否实现了前辈们追寻的编辑出版理想？

我们更不能忘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薄一波、李一氓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一次次指示与重托。几十年来，关怀铭感于心，记忆葆有温暖。我们会牢记“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提高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的嘱托，努力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者和内容提供者。不忘担当，不辱使命！百年登览，我们肃然驻足。

在构筑中华民族特有的核心价值理念、倡导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由衷认同：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一代代倾心尽力、总结提炼人类文明精粹的学人们，同时也成就了为构筑中华学术文化史与广大民众精神世界做出特别贡献的这家出版社。中华书局幸哉！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珍视历史和传统的时代。整理中国古代典籍，传承优秀文化，商量旧学，培养新知，是我们的自觉。为社会提供绵久的书香，我们当凝神聚力。

今天，是一个敛集幸福、期待花放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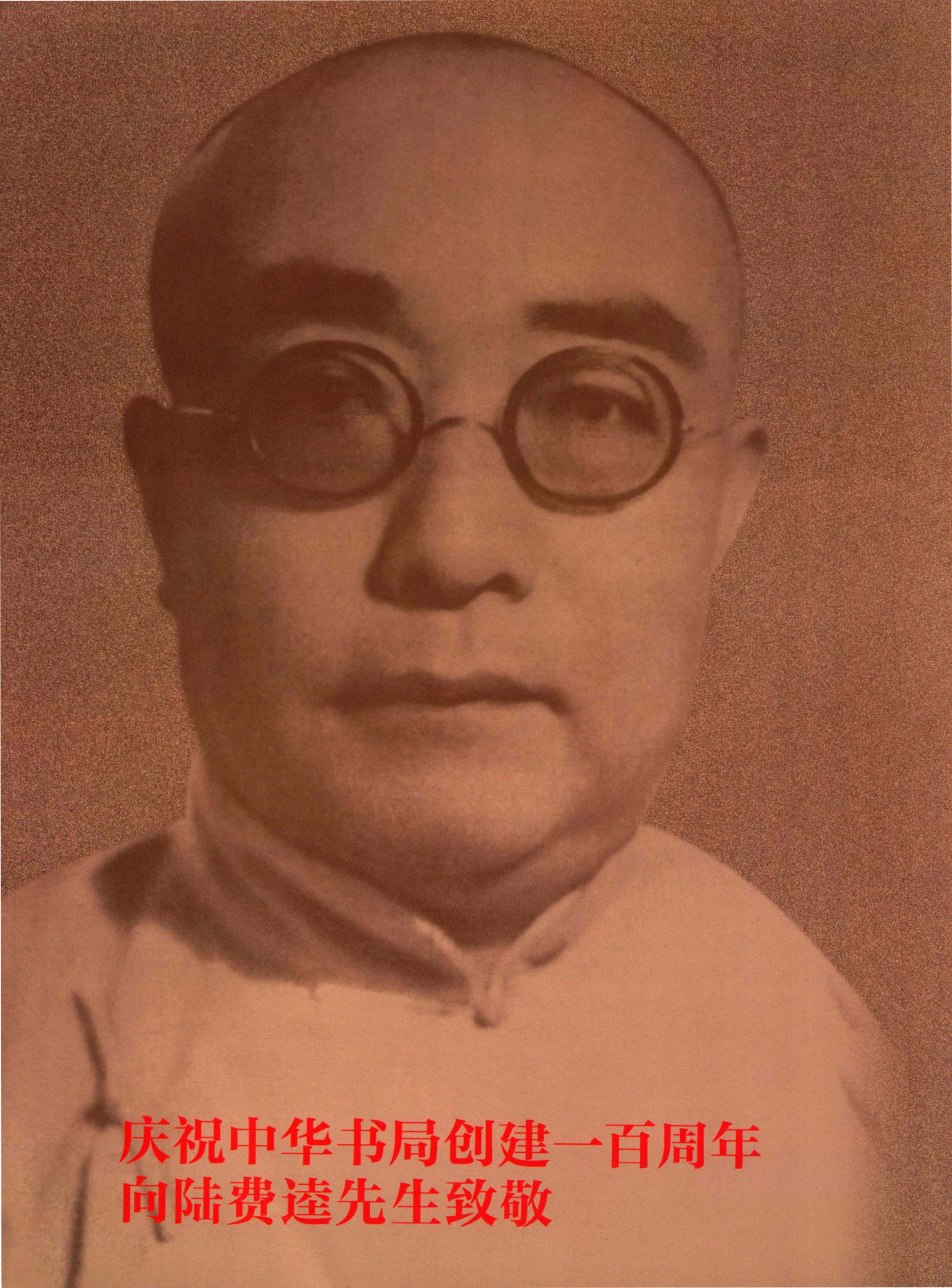
今天，是一个凝聚力量、蓄势待发的时刻。

今天，是一个直挂云帆、远望前程的时刻。

百年中华，在这一天，再出发，向着新的百年，向着新的辉煌。

——中华书局创建一百周年寄语

李岩



庆祝中华书局创建一百周年
向陆费逵先生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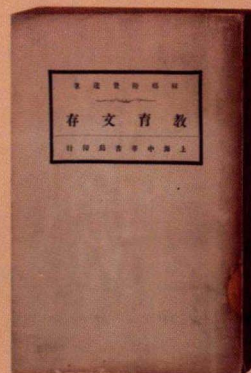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浙江桐乡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几乎自学成长。18岁在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任经理，并参加革命党人的团体“日知会”，从事革命活动，任评议员。19岁任汉口《楚报》记者和主笔，不久即到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员，21岁进文明书局，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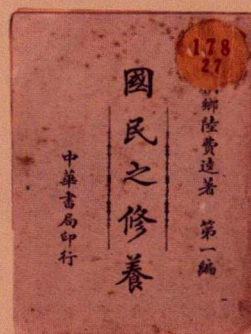
岁进商务印书馆，次年即担任该馆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师范讲义所主任。

他在1905年发表的《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是我国改良文字、统一语音运动的先声。1909年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他反对盲目尊孔读经，支持男女同校，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思想议论新颖，富有新精神，对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见解。

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领导其迅速跃升为全国第二大出版机构，并一直担任掌门人。随着书局的日益发展，陆费逵声望益著，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抗战开始，他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1937年11月，陆费逵离开上海到香港主持工作。1941年逝世于香港寓所。叶圣陶先生作挽联：“识世是英雄，伟业创于开国岁；擘谋推祭酒，书林不尽忆公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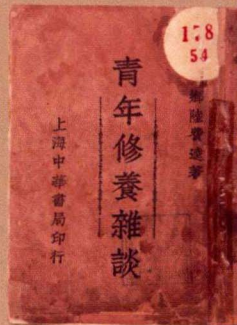
《教育文存》（陆费逵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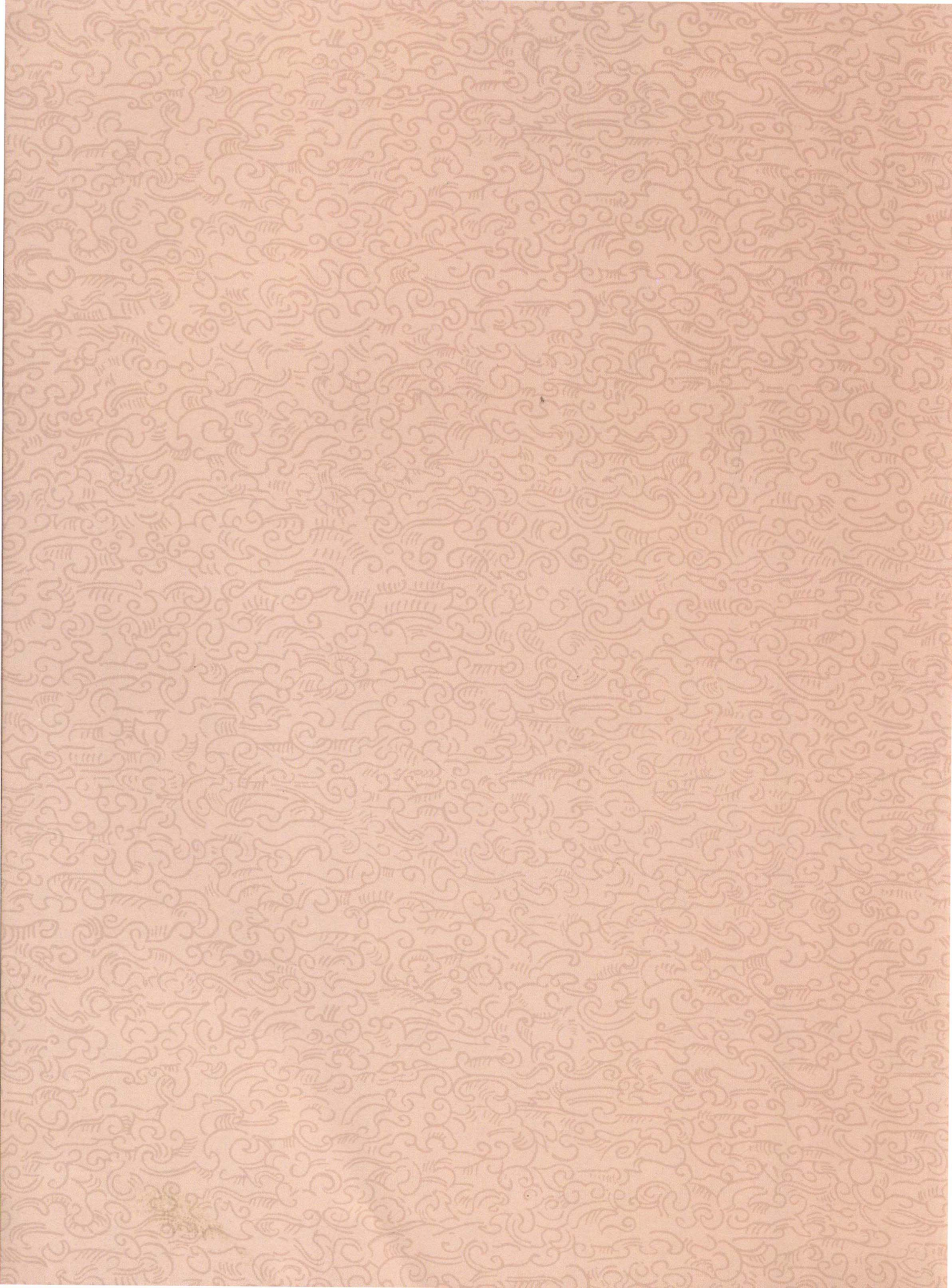
《国民之修养》（陆费逵著）



《妇女问题杂谈》（陆费逵著）



《青年修养杂谈》（陆费逵著）





创业辉煌

1912—1949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陆费逵



中华书局·上海河南路总店（1916年落成）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陆费逵

这是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百年前提出的出版理念。在纪念中华书局创建百年之际，我们重读这一段文字，就能够理解中华书局百年辉煌的必然性。陆费逵先生对出版业的认识与实践以及一代代中华人的努力，铸就了中华书局百年不渝的传统，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强盛进步、文化学术的传承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强国，是20世纪初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梦想。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18岁就在武昌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任《楚报》主笔，抨击时弊，而遭当局通缉。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创办并主编《教育杂志》时，发表了大量宣传教育救国、具有革新创见的论文，倡议学制改革、简化汉字、统一国语、统一国音、推广白话文、男女共学等。

1911年，清王朝风雨飘摇。陆费逵以超人的眼光和胆识，预感到帝国大厦将倾，共和政体必兴，暗中计议策划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政体需要、体现自己教育思想的中小学教科书。

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时宣告成立。

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

——陆费逵《论今日学堂之通弊》

《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书》

中華書局宣言書

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往者異族當國政體專制束縛抑壓不遺餘力教科圖書鈐制燭苦自由真理共和大義莫由灌輸即國家界說亦不得明最近史事亦忌直書哀我未來之國民究有何事而受此精神上之慘虐也

同人默察時局險懷宗國隱痛在心莫敢輕發幸逢武漢起義各省響應知人心思漢吾道不孤民國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適宜之教科書則革命最後之勝利仍不可得爰集同志從事編輯半費以來稍有成就小學用書業已蕆事中學師範正在進行從此民約之說彌漫昌明自由之花商皇燦爛俾禹域日進於文明漸獲葆其幸福是則同人所嚮香瞻祝者也茲將本局宗旨開大綱列左

一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

二並采人道主義政治主義軍國民主義

三注重實際教育

四融和國粹歐化

在陆费逵先生主持下，中华教科书伴随着中华书局的诞生问世。

这套教科书，初等小学有修身、国文、算术、习字帖、习画帖5种50册，教授书3种22册；高等小学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英文法8种33册，教授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27种50册。

这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陆费逵语）。

中华书局从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而出版发行教科书也一直是中华书局的主要业务之一。那时提起教科书，人们就会想到中华书局。从1913年到1937年，中华版教科书不断修订重编。1932年开始，中华书局还陆续编辑出版了4套专供东南亚国家华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版教科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中华教科书”后，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新制教科书”、“新编教科书”、“新式教科书”、“新中学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尽力满足民国学校教育的需求。

从我进入“高等小学”之日起，也就是说，从我开始接受近代化的启蒙教育之日起，我就和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从乡村到县城中进入高等小学的。这所小学中师资的质量并不甚好，但所用课本则全部都是中华书局编印的：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算术、理科（后来改称自然）、农业、修身，一律皆为“新式中华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使我的耳目一新，扩展了我的视野，也开拓了我的思路。例如，这时我才知道世上的伟大人物并不只是尧、舜、三王、周公、孔子、孟子、朱熹等人，而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课本中译为奈端）、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及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等人，也同样是一些伟大人物，如此等等。……我之所以得到这些知识，都是从中华书局编印的课本中得来的。

高小毕业后，我考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在那里，在所采用的教科书中，有很多依然是中华书局编印的。

——邓广铭《追怀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

《回忆中华书局》（下编），中华书局，1987年

1919年，在保定读小学，所用的课本就是中华书局编印的“小学校新国文教科书”，开头几课的课文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边是图，一边是字。到自己能够看故事书时，最喜欢看的是中华书局发行黎锦晖编的《小朋友》，一周一期，每期不误。黎锦晖是位音乐家，他编的《月明之夜》《葡萄仙子》等儿童歌剧，都在《小朋友》上连载发表。到中学时，这些歌剧常常上演，我是琴师，每次都随场伴奏。大学毕业后，在中学讲授国文和历史、地理，一部分教材选自中华书局的教科书。

——王树民《我与中华书局之间的奇缘》

《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



《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课



《少年周报》

《儿童画报》

《小朋友画报》

在编印各种教科书的同时，中华书局很注意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14年创办了《中华童子界》《儿童画报》；1922年又创办了《小朋友》；1926年出版了《小朋友画报》。此外还先后出版了《中华学生界》《少年周报》《中华少年》《初中学生文库》《中华故事》等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其中以《小朋友》影响最大，历时最久。1952年，《小朋友》交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宋庆龄题写了刊名。几十年过去，许多老人至今对中华书局当年出版的这些有益的课外读物记忆犹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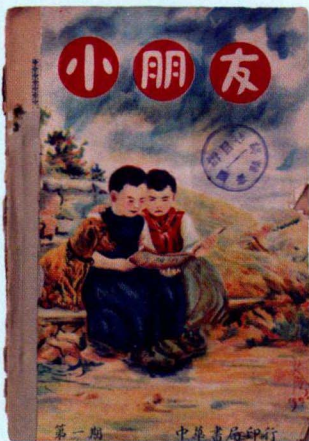


《中华故事》



螢火蟲
夜夜紅
飛到西
飛到東
好像小燈籠

《小朋友画报》内页



《小朋友》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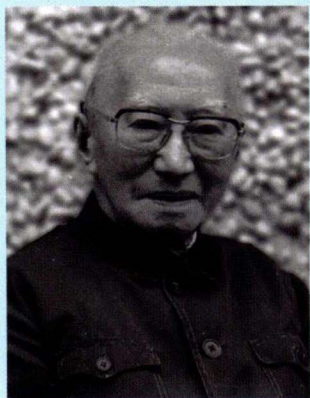


《小朋友》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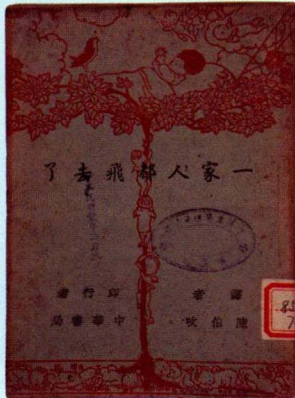
《小朋友》创办人为黎锦晖，第一期发行20万册，迅即成为风靡全国及南洋、日本等地的热销刊物，发行量最高时达180万册之巨。其中的插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童心趣味，线条单纯流畅，色调清新明快，大都为现代画家赵蓝天创作。



《小朋友》第一期中的故事诗，黎锦晖创作。



陈伯吹(1906—1997)，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1943—1952年在中华书局任编审，1945年《小朋友》复刊后任主编。一生著、译儿童文学作品及理论近300万字。右图为陈伯吹译《一家人都飞去了》。



1923年是我执教的第二个年头，中华书局出版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补充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

——陈伯吹《我和中华书局》

《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华书局，1982年

1922年中华出版的《小朋友》创刊，我还在保定上小学，就开始向《小朋友》投稿，所得的稿酬是《小朋友》用的信封信纸和稿纸。

——胡厚宣《回忆我同中华书局的关系》

《回忆中华书局》(下编)，中华书局，1987年

记得我是虚龄四岁开始识字的。启蒙的课本不是《三字经》《千字文》，也不是从“人、手、足、刀、尺”开宗明义的小学教科书(那我入小学时才开始接触它)，而是当时中华书局一册又一册陆续出版的《中华故事》。印象中它是红皮封面，薄薄一本，内用油光纸石印，有文有图，文字是用文言文撰写的。

在我读小学时，我曾连续几年把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小朋友》当做“课外必读书”。现在只记得这套杂志主编者名吴翰云，撰稿人中有陈伯吹。当时除《小朋友》外，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一套少儿杂志名《儿童世界》，我曾读过几本。但我对《小朋友》情有独钟，后来对别的少儿读物就不大爱看了。这个杂志有一专栏名曰“儿童创作栏”。我当时在哈尔滨市第十七小学读书，曾写过一篇短文直接寄给吴翰云先生。承他回信，告以那篇习作将在《小朋友》某期“儿童创作栏”中发表。寄稿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到我的那篇处女作刊出时已在东北版图变色之后，因此哈尔滨彼时已看不到《小朋友》了。直到1935年，我在北平育英小学(我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的图书室里，才翻到尘封已久的《小朋友》合订本，亲眼“欣赏”到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大作”。

——吴小如《我与中华书局的深情厚谊》

《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